

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我国打击治理电信诈骗能力不断提升

 新华社 刘奕湛

从建立23个部门和单位参加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合力打击电信诈骗,到健全涉电信诈骗犯罪侦查工作机制;从深化跨境跨区域警务合作,到建立诈骗电话通报阻断、被骗资金快速止付机制……

两年来,一系列打击治理电信诈骗犯罪机制的创新,实现了侦查打击、重点整治、防范治理三位一体,坚决把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切实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

23个部门合力打击治理电信诈骗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持续多发高发,手段日益复杂、新骗术层出不穷,让许多受骗者蒙受巨大损失,严重影响人民群众财产安全。

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中央领导同志多次作出重要批示指示,明确要求坚决把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2015年6月,国务院批准建立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由公安部、工信部、中宣部、中国人民银行23个部门和单位参与,标志着打击治理电信诈骗工作成为一项系统性工程,多方加强协作、统筹社会资源,共同下好“一盘大棋”。

2015年10月,第一次部际联席会议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任务,部署23个成员单位联手集中开展打击治理专项行动,形成打击治理的强大合力。

2016年2月,第二次部际联席会议提出创新打击方式、建立新的工作机制、提升打击实效、深化跨境警务合作、加强合成作战、打击周边灰色产业等方面的具体措施。

2016年9月,第三次部际联席会议部署各级公安机关发挥主力军作用、创新工作方法;各部门建立完善通报制度,大力推进反诈骗中心建设;强化源头治理,深入推进对电信企业、金融行业、互联网领域清理整顿。

这样一份“棋谱”盘活了各种社会资源,深入推进专项打击行动,对电信网络诈骗分子布下越来越紧密的防线。

2016年,全国公安机关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同比上升,共破案8.3万起、上升49.6%;电信网络诈骗发案大幅上升的势头得到遏制,去年9月以来连续4个月发案大幅下降;2016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损失同比下降10.9%。

高效联动实现更强打击能力

近年来,各级公安机关既打击境内地域性职业电信诈骗犯罪分子,又打击境外活动侵害境内的电信诈骗犯罪团伙;既打击电信诈骗犯罪活动,又打击灰色产业链条,形成了打击整治电信网络诈骗的高压态势。

“科学组织指挥、快速接警止付、集中研判侦查、高效打击处理。”一时间,跨区域、多警种联动高效的全国一体化作战新格局逐渐形成,破案数、打掉团伙数、查处违法犯罪嫌疑人数同比都成倍增长。2016年,全国共打掉诈骗团伙7682个,捣毁诈骗窝点8107个,公安部先后发布A级通缉令通缉23名在逃人员,目前已抓获22名。

在公安部的统一组织指挥下,各地公安机关在打击淘宝代运营诈骗、“重金求子”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中屡创佳绩。

同时,公安机关还切实加强国际和地区间执法合作,在外交部等有关部门的协助下,仅2016年,公安部先后18次组织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湖北、广东等地赴境外开展工作,从肯尼亚、老挝、马来西亚、柬埔寨、西班牙等世界各地押解回国561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其中台湾人219名。

此外,各地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紧紧抓住为诈骗犯罪提供“服务”的各个环节,向“黑广播”“伪基站”“开贩银行卡”“洗钱”团伙等灰色产业群发起猛烈攻势。2016年,共缴获“黑广播”3239套、“伪基站”设备3544套,破获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案件1868起。

建章立制齐抓共管强化防范治理

2015年,北京市公安局成立全国首家省级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心和查控中心,2016年,上海市反

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建立运行……各地公安机关反诈骗中心建设相继进行,一批建设标准严格、职能定位明确、集防范、打击、治理于一体的实战化运作平台陆续建成投入使用。

2015年以来,全国已建成32个省级反诈骗中心和181个地市级反诈骗中心,国家级反诈骗中心已全面启动,公安机关各警种分工合作,积极配合,银行部门负责涉案资金拦截以及配合资金流侦查,电信企业负责关停涉案电话号码以及配合开展信息流侦查,初步形成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信息共享、合成作战、快速反应、整体联动”的整体架构。

公安部还在上海、苏州、金华、厦门、深圳、珠海等地建立6个研判中心,在阿里巴巴集团和腾讯公司建立2个防控中心,8个中心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全面开展境内境外窝点和全犯罪链条研判,有效助力了全国公安机关的打击防控工作。

《关于进一步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的若干意见》《关于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通告》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明确了各部门职责任务,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进一步落实防范、整治、打击各项措施,齐抓共管的格局基本形成。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人民群众不仅要求将嫌疑人缉拿归案,更对止损挽损提出更高希望。对此,公安机关积极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发布《关于建立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涉案账户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的通知》,全力在止损、挽损方面下工夫。

截至目前,已有3382家商业银行、7家支付机构接入,全国公安机关通过平台查询、止付、冻结65.14万笔,成功止付7.3万个诈骗账号,止付金额达11.3亿元。

为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期待,2016年12月6日,公安部会同银监会制定出台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案件冻结资金返还若干规定实施细则。目前,已成功发还事主被骗款项1亿余元。

此外,为了给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有力法律保障,2016年12月19日,公安部会同最高法、最高检研究出台了《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不仅进一步明确了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法律标准,而且实现了对此类犯罪的全方位全链条打击,为更加有力有效打击犯罪发挥了重要作用。

春节回家调研乡风民俗,听老乡说困扰道心声—— 人情债 真想减下来

 人民日报 张志锋

新春佳节,万家盼团圆。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雷望红的姨妈,却不“敢”回老家,而是“躲”在打工地福建过年。再三追问才明白,“春节回家至少要送出1万元礼金,不回来是怕送人情。”

在中部农村,这种“乡村人情故事”并不稀奇。这个春节,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贺雪峰团队的师生们,共同聚焦了一个现象:农民送人情的压力越来越大。许多农民希望政府引导、乡村自治,走出变味的人情泥潭,营造健康的乡里人情。

人情之重成为困扰 春节有时一天要送三四份礼

“我们多次在全国各地农村调研,不止一次听到农民说,中央八项规定好,农村能不能也有这样的规定,引导人情往来。这一方面体现了农民对八项规定的高度认可,也同时表达了改变人情现状的迫切心情。”春节前后,该中心副研究员桂华,博士生刘成良、雷望红等人回家、调研,获得大量数据、案例。

送人情集中在春节前后。有个山区贫困县30多万人,2015年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近6万人。春节前后一个多月,一些村组几乎每天都有人请客。按当地风俗,一户办事,同一村民组的都会去贺喜。许多农户隔三差五赶场子、送人情,有时一天要送三四份。

请客的名目多了,办酒席的规矩也渐渐乱套。在湖北中部一个县,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为帮儿子凑钱买车,提前4年给自己办了七十大寿。最不可思议的是如今一些地方办丧事,安葬老人不再是主要任务,办酒席、收人情成了重头戏。

结婚宴席也在变,过去只有初婚才大办酒席,现在很多再婚夫妇照样大宴宾客,一些村民认为有滥办敛财之嫌。成大叔有一儿一女,儿子结了两次婚,女儿也结了两次,都办了酒席。有村民就咬着牙说:“去他家吃喜酒都吃了4次,他要是离婚再结婚,绝对不去了!”

礼金标准逐年上涨。在有的地方,目前“行情”是,一般农户每次送出200元,特别贫困的送100元,姑舅姨等近亲送1000至5000元不等。几个农户的人情账单显示:2010年

前后仅50元,现在100元“送不出手”。近亲的礼金涨得更凶,一般千元起步。

此外,近些年还出现了一种不好的风气。一些农民认为,酒席规模大小反映“朋友圈”的大小和人缘好坏,为了面子千方百计扩大人情范围。一个包工头去年办酒席,四处请客,共收礼金60多万元,还有人一次就收了90多万元,而这些人情故事却很快成为“有面子”的“美谈”。

变味人情没有赢家 硬着头皮办,不办亏更大

人情负担越来越重,一些农户感觉快被“掏空”了。

大体上,一个普通农户的人情“朋友圈”约200户,每户五六六年办一次酒席比较普遍。按这个节奏,平均每户每年要送30多次礼金,人情开支一万到两万元,家庭经济状况好的在两万多元。农民家庭收入约三成用于人情消费,有的家庭占到一半。

在湖北中部一个县,贫困户、低保户每年人情开支都达到5000多元。粗略一算,不少农户家庭人情支出超过了贫困线标准的人均年收入。一些农民说:村里绝对贫困的很少,多数是相对贫困。相对贫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情负担太重,有农户表示:“应付人情都喘不过气来,哪里还有钱来搞项目增收!”

办酒席要花钱,长远看没有“赢家”。办酒收礼,再还礼,再办酒……在湖北一个贫困县农村,办一桌酒席加上烟酒,共需300多元;一般有200户送人情,酒席成本大概两万元,收礼金约5万元,办一场能赚3万多元。农民都清楚,赚

的钱总是要“还”的,办酒席最终还是亏的,但不办酒席亏的更多。最终陷入怪圈:人人争着办,不办亏更大,再不情愿,硬着头皮也得办。

有个农户过去办酒席,朋友送了礼金。后来这个朋友也办酒席,这个农户感觉吃不消,没去喝酒,也没还礼。结果,对方直接上门,把过去送的钱要了回去,闹得很不愉快。

在湖北中部一个县,还人情的时候还要加钱,以显得“更加厚道”。只要沾亲带故,这次收500元,下次要还1000元,再下次变成1500元,像滚雪球一样玩起“人情+”。亲戚间一次送一两万元的,大有人在。互相攀比,水涨船高,加重人情负担。

清爽乡风期待共建

政府引导、乡村自治、村民自觉

人情这么重,不“赶”行不行?

“在农村,人情比吃饭都重要。饿肚子可以忍一忍,人情关系不维持,会被人看不起,今后在村里没法做人。”

2016年6月,雷望红老家的群众中忽然热传一个消息,据说乡政府正在酝酿出台“限酒令”,规定只能办满月酒、白事、婚嫁酒和高寿酒(80岁以上的整十岁),7月1日实施。

这一消息传开,许多村民拍手叫好。谁料,没过几天形势急转。当时高考在即,一些村民听说消息后,纷纷赶在7月1日前为子女办升学宴。有的孩子才上高一,也提前办了升学酒。到了7月1日,传闻中的“限酒令”并未出台。

对一些酒席的规范,不少地方进行了探索。春节前,贵州凯里市出台规范操办酒席行为的试行办法,引发热议。

清爽乡风,除了乡亲们期待的政府引导,也要鼓励乡村自治,激发村民自觉,对此,多地探索将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约,把红白理事会建设作为重点,使农民群众的经济负担明显减轻,社会风气也得到改善。

以山东为例,截至去年10月,全省就建立起红白理事会8.6万个。红白理事会由群众推举出德高望重、热心服务、公平公正、崇尚节俭、有一定礼仪特长的人士组成,按照统一标准、流程和仪式,免费帮助群众全程操办红白事。

雷望红试探着问过妈妈,村里要有红白理事会这样的机构,老百姓会支持吗?妈妈毫不犹豫地说,“我第一个举双手赞成,我敢保证,其他村民都会同意。”